

马克思生态休闲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于 萍, 马湘芊

摘 要: 休闲是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休闲思想的论述富含了深刻的生态意蕴, 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样态。其中, 生产力高度发展下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首要条件, “人类同自身和解”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解”相统一基础上的劳动和休闲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必要条件, 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最终旨归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共产主义生态休闲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生态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生态休闲; 共产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A811.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4)02-0001-09

休闲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症候”, 是其内含逻辑和规定的“空白”之处, 通过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休闲的“解蔽”, 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休闲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然状态的追寻。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中合乎自然规律及人自身需要的休闲可以称之为生态休闲, 富含了深刻的生态意蕴。学界在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长足探索中, 对“马克思是否有休闲思想?”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回答, 但对马克思休闲思想更为深入的挖掘仍有较大的理论生长空间。随着我国逐步迈入“普遍有闲”社会, 生态休闲成为时代所需回答的重要发展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以共产主义为视角对马克思生态休闲思想的解读, 不仅能够推动学界对马克思休闲思想生态维度的研究, 而且能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下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生态休闲”一词, 但在对自由时间的相关表述中, 却构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样态。伯克特指出, “只有以共产主义所有制为前提”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1], 自由时间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异质性”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生态休闲所不可忽视的重要要素。一方面, 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生态休闲提供物质基础和时间基础, 在最优的物质变换下, 自由时间的析出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休闲赋予生态属性, 因而是生态休闲。另一方面,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财富”用于个人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研究”(TJKS21-008)

作者简介: 于萍,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yu_ping0105@163.com (天津 300350); 马湘芊,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锦州 121013)

的发展和享受活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这种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休闲实践是无损自然甚至益于自然的，是具有亲生态性的休闲实践。

（一）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生态休闲提供客观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重要特征，生态休闲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更高层次的休闲方式，同样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态休闲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条件下，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以满足，且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充分盈余，出于对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对更高层次的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休闲实践的自觉要求。

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实现生态休闲提供物质基础。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使休闲不再为“物的依赖性”所辖制，真正发挥调节人类生产劳动，减缓过度生产劳动破坏自然生态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人们将再次陷入物的依赖性中，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在这种对必需品的占有的斗争中，休闲只会沦为压迫人、奴役人的手段，成为过度索取自然、迫害自然的途径，而丧失其自身所具有的生态属性和发展人本身的价值旨归。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且有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在资本逻辑下，物质财富仅仅掌握在少数的“有闲阶级”手中，他们所拥有的闲暇、娱乐，仍是低层次的、对物质占有的需要，是以无节制的社会生产以及损害自然为代价的异化休闲。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生产劳动真正以人的内生需要为尺度，效率高且节制有度的社会生产将带来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减少生产能耗、供给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这种丰富将为一切人所有，“普遍有闲”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这就为每个人从事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认知本性，发展能力的生态休闲实践提供物质基础的保障。

其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实现生态休闲提供时间基础。作为生态休闲重要要素的自由时间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自由时间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析出”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印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休闲在生成之初就具有生态属性。在共产主义社会，时间的规定仍然发挥着作用，“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2] (P67)}，而这种节约则完全指向以生产力的提高为依托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的生态效益在于这样一种被“合理地调节”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3] (P928-929)}的最优物质变换的实现。随着科学技术的接续发展，最优的物质变换就意味着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率的最大化提升，即不断优化质量的同时最小化物质的投入，利用循环经济实现废料的再利用，以更少的物耗满足更多的需求，同生态圈共频实现动态平衡。在这种最优的物质变换下，生产社会所需物质的劳动时间绝对减少，自由时间得以析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的缩减，从而减轻自然环境的压力，并且为自然自身修复周期提供时间上的保障，使得自然留有余力实现自身的修复降解、维系自身的平衡。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盈余为共产主义社会休闲的出现提供了时间基础，同时自由时间在析出这一进程中本身所携带的生态效益，也使得共产主义社会的休闲是一种基于生产发展进而生成的生态休闲。

（二）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具有亲生态性

休闲并非对自由时间的消极占有，而在于对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自由时间为休闲的生成提供前提条件，而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才真正使休闲转向更高层级的生态休闲。这种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休闲实践是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适应的，是具有亲生态性的生态休闲实践。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也即人能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人将自身的感性活动作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以此印证自身存在。在这种互为佐证的对象性活动中，人与

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人与自然的交往实践是良性的、可持续的, 因而人的休闲实践同样也是人在自然界中展露自身本质力量, 满足自身生态需要的生态休闲实践。在这一实践中, 人真正将自身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结合, 亲生态性真正归落于人的本性。人自身所具有的生态属性、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亲生态性, 使得在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休闲实践活动具有亲生态性, 因而是生态休闲。

马克思曾对“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进行对比, 提出在不考虑个体能力差异的情况下, “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4] (P361)}, 由此可见, 欣赏人类文明结晶的音乐活动和消费香槟酒这种感官享受活动所体现的价值感是有差异的, 前者具有更高层次、更符合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要求。仅仅关乎个人享乐、消遣的活动所展露的低层次活动是同人物质世界的依附相生的, 人们依靠对物质产品的量化占有以印证自身的存在, 人本真的自然属性被压抑, 不仅无益于自身的发展, 甚至将人变得片面单薄, 同时也造成自然的无意义损害, 是有损于生态环境的异化休闲。而在摆脱了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个人不再被特定的强加于他的活动范围所辖制, 而在更多的活动领域中发展着自身的能力。因而, 在他从事这些活动时, 他不是以占有确认自身存在, 而是真正在同自然的积极互动中印证自身存在的生态休闲实践。只有摆脱了物的依赖性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懂音乐”的人, 更高级别的活动将是一种利于自身发展、社会进步的活动, 也将会是有利于生态环保或者本身具有生态审美性的活动。

二、“两个和解”基础上的劳闲统一: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必要条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在地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5] (P184)},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休闲反生态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将自然作为无限掠夺和获得利润的对象, 劳动成了给劳动者带来极大痛苦的异化劳动。资本对增殖的追逐造成的过剩生产不仅同用于休闲的自由时间, 也同生态环境本身有限的承载力之间有着必然的冲突。在消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6] (P563)}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全社会才得以盈余出物质资料, 使人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得以可能, 人也回归到了更为自然的状态, 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并能够充分发挥兴趣和才能, 休闲与劳动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因此,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基于“人类同自身的和解”而得以实现的, 两个和解的统一成为劳动与休闲实现统一的根基, 使得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休闲实践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态休闲实践。

(一)“两个和解”的统一为生态休闲提供了和谐关系的保证

恩格斯早在同国民经济学家论辩中就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5] (P6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提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5] (P185)}, 预设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自然主义之所以与人道主义得以相通, 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形式总是包裹着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内容”^[7]。因而, 只有在“人类同自身和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 只有彻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本质上得到改善。共产主义社会中, 生态休闲是“两个和解”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样态。

生态问题表面看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背后却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因此, 只有解决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问题, 才能摆脱资本对休闲的干预及对自然的损害。“一定的社会形态必然制约和框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既存形式与发展”^[8], 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必然会造成劳动与休闲的对立、人与自然的交恶。一方面, 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发展, 纵使拥有此前历代之和所难及的生产力, 资本主义社会中仍无法析出供人发展

的自由时间，其根本在于私有制下人对人的剥削，资本家将工人所拥有的具有自由时间“潜能”的闲暇时间尽可能地转变为劳动时间，以超越自然承载力的生产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在缺失了作为休闲根基的自由时间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对休闲进行驱逐，资本家皆为“死后哪怕洪水滔天”^{[9] (P311)}的亡命之徒，他们只关心切实可见的利润而全然不顾其所产生的后果。无序扩张的生产是社会的“主旋律”，休闲的“空场”使得自然仅仅只是作为同劳动力结合可实现利润获取的“原料”而存在，而非人的生存之境。另一方面，资本家绞尽脑汁地为工人创造出一个商品林立的消费景观，物质性消费被包装为休闲的样态，异化需要和消费景观不断为自然“赋值”，将自然打磨成商品堆积在整个资本消费市场之中，以供异化休闲所驱使，因而这种异化休闲注定是反生态性的。自然的共有在私有制下只会豢养出一批批穷凶极恶的掠夺者，珍视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这种内存于资本逻辑中的短视步步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生态危机。因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私有制，自然才能完全地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休闲才真正摆脱资本的干预，恢复其亲生态属性并走向人的自由发展。

在扬弃资本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新形式，人与人之间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使得劳动和休闲的统一成为可能，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力表达，也是对抗资本无序扩张，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所带来的时间的相对节约，是同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时间的绝对节约并重的“首要的经济规律”^{[2] (P67)}。与生产资料公有相适配的是“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0] (P300)}。而这种“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3] (P208)}，因此，满足基于人的实践活动而生成的社会需要成为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这种社会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良性调配。正是在这种动态平衡下，生产变得有序而具有生态友好性、可持续性。对时间资源的合理调配保障了自由时间的析出，且平等地为每一个人所有，休闲同劳动一样成为人们的内生需要；而对物质资源的合理调配则使资源耗损最大化缩减的同时，生产出丰富的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在实践中日益生发的生态需要。生态休闲也即人与人和谐关系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有生态友好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只有在“人类同自身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解才得以达成，而这“两个和解”的统一，为生态休闲提供和谐关系的保证。

（二）劳动与休闲的统一使生态休闲走向自觉

在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同自身的和解相统一的基础上，劳动与休闲也实现了统一。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同自身的和解，这两个和解的关系是劳动与休闲的关系的实质所在，而劳动与休闲的关系是这两个和解的关系的具象表达。劳动与休闲实现统一所直接带来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一问题的实质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否实现和谐。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被废除，消灭剥削压迫后的劳动不再是人们感到痛苦想要逃避的异化劳动，而是能够寻找到自己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生产的动机“是享受，而不是发财致富本身”^{[11] (P137)}，休闲在建设性的社会生产中，不仅没有受损而且实现了本真的意义。劳动与休闲的统一使休闲回归了生态休闲的本性，也使生态休闲走向了更加自觉的发展，从而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对劳动和休闲关系的认识是隐于对劳动的分析之中的，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劳动”是具体劳动，是“社会地规定的劳动”^{[2] (P400)}，而非黑格尔所述的抽象的精神劳动，它所内含的是特定社会所生成的社会关系，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就是“‘买者和卖者’之资本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体现”^[12]。在资本逻辑下，这种由人与人之间矛盾所造成的无节制的生产劳动，同时也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磨合的矛盾。实质上“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和资本与自然的对抗是一致的”^[13]。在这一劳动中，“工人把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

无机自然界之间”^{[2] (P196)}，工人被剥离出生产过程，他并非出于自身的生活目的而对自然物进行占有，他成为被支配者，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9] (P582)}投入整个社会生产之中。劳动者同自然的剥离，使得劳动者逐渐丧失对自然的感知与自身原初的自然需要。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对剩余劳动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的“错觉”，指出自然所恩惠的闲暇时间，如若“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9] (P589)}。因而，此时的劳动和休闲的关系呈现出对立之态，劳动时间在资本操纵下侵蚀着自由时间，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产生的异化劳动是同真正的休闲相对抗的有悖于人自身发展的。而共产主义革命作为否定现存世界的革命运动，所要求的便是这样一种“消灭劳动”，即消灭外部强制的异化劳动，消灭特定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消灭那种人同自然相剥离的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为自己生产”的历史条件得以满足时，生产劳动就扬弃了其异化状态，“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0] (P311)}。劳动不再是压迫人的力量，而成为真正的解放人的力量，人们在劳动中探寻生命的意义，从而确证自身的存在。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就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6] (P435)}，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和能力，自由自觉地进行劳动，他可以时而又不仅仅是猎人、作家、工匠、小提琴家，他可以任意成为其所是。而在这种共产主义的劳动中，劳动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就被彻底打破，捕猎、写作、弹奏同样也可以作为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休闲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劳动同时也是自由自觉的休闲活动，处于发展中的人是在将业已积累的知识运用于生产劳动使自身得以锻炼、不断成长起来的，劳动在这一意义上同休闲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同时也强调“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2] (P174)}，这种自觉而非自发的活动使得休闲同时也具有了劳动的属性，在这种休闲中的人同在劳动中的人一样展示着自身的主体性，并在这种活动中不断发展着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作为“活的劳动”成为“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14] (P46)}的手段，劳动以异化之态同人自身相对立，在无序扩增的劳动中，休闲不过是无妄之谈。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从目的转化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4] (P46)}，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同休闲共通，作为休闲而存在，即“休闲化劳动或劳动化休闲”^[15]。在劳动和休闲实现统一时，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完全以人自身为意义所在，“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永恒自然条件”^{[2] (P477)}，对于承载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这种劳动不是压榨自然而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进而成为弥合私有制下人与自然之间分裂冲突的重要环节，这种休闲化劳动因而也是生态劳动。这一劳动的主体不是直观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 (P174)}，人同自然的原初联系得以恢复，人在生态劳动中实现自身的能动作用。因而在这一劳动下，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能量互换以及双向的生成，即一方面“自然界向人的生成”，通过劳动，人将外在的自然属性和规律“内化”，使之成为人自身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人向自然界的融化”，人借由劳动所同化的自然力，在主观能动性下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至自然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态劳动与生态休闲不过是一体两面，共同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就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主体旨归

马克思共产主义生态休闲的最终旨归在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扬弃异化的人将生态需要作为自身的内在需要，人在自然中的休闲活动成为满足人生态需要的重要途径。而在这种生态休闲活动中，人真正摆脱了依赖性而将其活动作为确证自身存在的重要力量，从而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一）人在生态休闲中恢复对自身生态需要的觉知

在资本主义社会，脱离休闲的异化劳动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不再作为人

自身的需要而仅仅作为人满足需要的工具，人同自然界的对立使得自然界遭受到了严重迫害。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扬弃异化的人是具有丰富感知能力的现实的人，良好的生态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真正的需要，生态休闲活动的开展是满足人的生态需要，服务于人的自身发展的。

首先，在生态休闲中人的丰富感知和需要实现复归，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的现实需要。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现存社会的否定，亦即对资本逻辑的否定、对资本主义所营造的虚假需要的否定，人的需要不是为消费景观所映射，而是来自自身的现实要求。在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不再是作为理性经济原则计算下的抽象人，而是有着丰富感知力的现实的具体的的人，他“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做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2] (P172)}。人在生态休闲实践中的这种感性对象化活动的复归成为扬弃异化的重要步骤，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占有自己的本质。自然作为“无机的身体”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拥有感性力量的现实的个人同样需要的是不被资本所剥削损害的优美生态环境。伯克特指出：“自由时间可用来发展环境感受性，使得生产者 and 他们的共同体能越来越感受到作为生产和自由时间本身的永恒条件的自然财富的地位。”^{[1] (P295)}在生态休闲实践中，人的环境感受性将不断得到发展，人真正将自然作为自身的“无机身体”。

其次，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的丰富与增长是生态友好性的。需要一方面具有现时性，需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且需要的对象、内容、范围、满足方式和程度都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在生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需要呈现出全面而丰富的样态。需要另一方面也具有超越性，人在生态休闲实践中所生发的需要会随着人的发展着的活动而相应改变，从而成为推动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持续力量。需要的满足接续着新的需要的生成，“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5] (P295)}。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持续增长，具有发展超越性的需要占总需要的比重不断增大，其满足不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而“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最小化，甚至可能是通过旨在带来那种最小化的活动来完成”^{[16] (P283)}。

最后，生态需要本身成为人生存发展的重要需要。生态需要一方面作为基本生存需要，是人通过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维系生存的需要，人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感性自然界为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作为更高级的享受发展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能够增强人的创造力，从而使人的心灵愉悦”^[17]，良好的环境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密切相关。共产主义社会中，休闲作为一种自觉的、有益于个人发展的创造性活动，同良好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是生态休闲。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指出，“马克思为人类需要比身体生存所必需的需要设置了更高的水平”^{[16] (P257)}。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域中，由于需要的历史性，人们会历史地生成生态需要，例如关于健康美观环境的需要，自然本身就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生态休闲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更高层次的生态需要而生成的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活动。

（二）人在生态休闲中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通过生态休闲，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休闲恢复了其自身的生态属性，而在这种生态休闲下，人真正将自由时间作为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在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下创造出共产主义社会不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首先，人在共产主义休闲中实现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 (P46)}，在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之后，人的感觉才得以真正地解放，在个人感觉和感觉对象的统一下，人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表现着自己的生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为其他力量所困，真正归于人自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才真正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人终将扬弃自身的异化，摆脱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成为真正自由的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使得个体的生存斗争

不复再现，人自身社会行动的规律、自身的社会结合不再作为强加的自然规律，而真正服从于人自身的支配，成为人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自觉的行动。共产主义社会中休闲活动的开展是合乎自然规律以及人自身需要的，因此这种生态休闲活动同时也是立足于必然王国，在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过程中生成的。

其次，人在共产主义休闲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价值理性始终要求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所致力于实现的。伯克特指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就是“社会的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实现的过程”^[1]，因而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休闲生活就是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生活，人在休闲生活中惬意地感知自然界，提高自身的审美素质，并发展自身的丰富能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生活重要的空间载体，同时作为人休闲活动开展的对象成为休闲生活的重要部分。马克思同时也肯定了休闲对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18] (P215)}。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是人自我发展的空间，在自由时间中开展的休闲活动同样也是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人主动地追求外部对象来规定自身、印证自身存在的活动；是人展示自身力量，获取摆脱奴役的条件，将对象化活动融贯于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的活动。自然，不论是作为物质的，抑或是作为审美的、精神的使用价值，成为人积极利用自由时间的对象化活动的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启示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仍是社会发展所致力于实现的应然状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掠夺自然的现代化，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马克思共产主义休闲思想的生态意蕴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生态启示。

首先，满足人民生态休闲需要，实现美好生态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致力于实现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应重视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态休闲需要的生成及满足，提高人民运用自由时间的能力，促使现代化的美好生态生活的实现。新时代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生态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有了更多的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重视人民内生出来的生态休闲需要，就是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对现实的人的感性力量的肯定。生态休闲所依附的便是拥有感性力量且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他将休闲化劳动作为自身力量的展露，不仅不会耗损环境，反而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发展这种能力的重要条件。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就曾指出，发展休闲，并非简单的铺路见景，而是要“把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19] (P166)}。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0]。因而，现代化的人是摆脱了物的依赖性而致力于人的自身发展，不再以消费作为休闲的表征，可以澄明自身的内在需要，积极利用自由时间以发展自身。在种种与自然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互动中，人的生态情感被唤醒，人的有机的身体和无机的身体融贯成为生命共同体，人真正实现其本质性的存在，而自然在其中不仅可以休养生息，更是得到了人文关怀和庇护。在人与自然互相成就、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中，现代化的生态生活亦即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得以实现。

其次，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生态生产。马克思在阐发生态休闲思想时，将其寄托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当代，科技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的盈余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损耗，给自然留有余力实现自身修复。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以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只有生产力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才能在创造社会所需物质上尽可能地减少时间的投入，实

现少消耗、多产出的目的,进而降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减少自然的负担。不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引起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中国要进行的是绿色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发展和自然财富的消耗全面脱钩”^[21],助推人类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的根本转化。十九大首次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2]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20],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的发展要同生态文明的提高相辅相成,始终坚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23](P282),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最后,制定生态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法律制度,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生态休闲的实现依靠“人类同自身的和解”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只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环境效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走西方以损害自然为代价的现代化老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2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方面的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23](P24)而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需要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制定可持续的生态发展战略,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重大工程,划定“生态红线”给自然以必要的人文关怀和时间空间,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使自然在其中得以止损、修复进而生息不止。另一方面,完善生态立法制度、执法监督与问责制度,明确权责关系,以严格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制规范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为保障生态环境划定底线,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落地,以“‘五位一体’的‘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4]。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隐蔽在自由时间、自由自觉的劳动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中的休闲,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而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中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生态启示。对生态休闲的关注不仅仅是对自然环境与人的自身发展的关系考量,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对美好生活的具象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实现需要在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共同推进,生态休闲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所应对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 [1] 彭学农.伯克特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维度[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邓莹,孙道进.恩格斯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及其当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8] 张涛.论共产主义的生态向度——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再解读[J].社会主义研究,2022(1).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许斗斗.论马克思的生产、技术与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5).
- [13]窦凌,耿如梦.《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二维向度思想及当代启示[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刘晨晔,许征帆.劳动——休闲——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两个内在逻辑基点[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1).
- [16][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17]蓝强.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视域下的生态需要特征[J].科学·经济·社会,2014(3).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9][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1]胡鞍钢.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
-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3]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4]王雨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求是学刊,2022(4).

Marx's Thought of Ecological Leisu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YU Ping, MA Xiang-qian

Abstract: Leisure is not only a basic way of life, but also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Marx's exposition of communist leisure thought is rich in profound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structs a communist ecological leisure patter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Under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positive use of free time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of communist society to realize ecological leisure. The unity of labor and leis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reconciliation" and "human and natural reconciliation" is indispensable for communist society to realize ecological leisure.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leisure in communist society aims for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Marxist communist ecological leisure thought provides beneficial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Marx; ecological leisure; communis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